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成都城市治理的历史经验

程福根

(福建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州 350117)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共产党十分重视城市治理。成都解放后,共产党尽快稳定社会秩序,为城市治理提供首要条件;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为城市治理提供领导保障;恢复和发展经济,为城市治理提供物质基础;确保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为城市治理提供社会保障。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成都城市治理的历史经验,对新时代城市治理现代化和完善治理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成都; 城市治理; 历史经验

中图分类号: K2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297(2020)06-0043-08

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高度重视城市工作,特别是在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之后,党始终把城市治理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建设“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人民群众的需求”^[1],发挥人民群众在城市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这是共产党接管和治理城市的一条重要经验总结,也是共产党治理城市一以贯之的重要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川西区党委的领导下,中共成都地方党组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注重稳定社会秩序、巩固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经济、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这深刻反映了中共成都地方党组织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治理理念,对新时代城市建设和发展仍然具有现实的启发价值。

一、尽快稳定社会秩序,为城市治理提供首要条件

成都解放初期,国民党特务、土匪恶霸、土豪劣绅等从事阴谋破坏活动,扰乱社会秩序,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不剿匪、不肃特,社会秩序难安定,人民群众不能顺利地进行生产建设以及各项社会改革。整治治安成为稳定成都社会秩序的一个重要条件,而“坚决镇压反革命的破坏活动是维护城市治安最关键也是最重要的一环”^[2],必须“坚决动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予以打击”^[3]。

(一) 清剿土匪恶霸,维护社会安宁

成都解放初期,匪患猖獗,土匪白天时而抢商店和路人,时而袭扰人民解放军,晚上在城内制造混乱,导致成都的老百姓人心惶惶,居民不敢上街,商店不敢开门。匪患严重,手段残忍,令人发指。面对土匪的暴乱横行,剿匪行动迫在眉睫。清剿土匪恶霸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需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在清剿土匪恶霸过程中,共产党依靠人民群众,人民解放军英勇作战,涌现出可歌可泣的军民融合事迹,彰显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执政理念。1950年2月,在成都市妇女工作团及妇筹会的发动、组

* 收稿日期: 2020-04-02; 修订日期: 2020-04-29

基金项目:福建省2017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基础理论研究创新团队“社会思潮基础理论研究创新团队”(闽委教思(2018)1号)

作者简介:程福根(1990—),男,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8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织和领导下,许多妇女积极参加农民协会和妇女自卫队。新繁县农协会副主席黄传秀、温江县妇女王玉华、大邑县妇女杨氏3人因为捉匪特有功,在“三八”妇女节大会上被授予锦旗和“毛主席的好女儿”的光荣称号^{[4]39-40}。

此外,成都市人民政府坚决贯彻党中央制定的“政治瓦解、军事打击与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实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以及宽大和镇压相结合的政策。解放成都的人民军队本着政治为主军事为辅、军政结合剿扶兼施的方针,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攻心为上”的具体策略,在猛打痛剿土匪恶霸的同时广泛开展政治攻势,使土匪恶霸内部开始分化和动摇,取得显著成效。成都有些参加匪乱的乡保长、散匪甚至股匪投案自新,交出枪支,如温江三益桥副乡长交出长短枪80余支,灌县石羊场、大兴场、中兴场交出长短枪400余支,新津周围每日到县政府投案者三四十人,崇宁匪特亦纷纷缴枪^{[5]327}。可见,共产党实行政治瓦解、军事打击与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成都大地长期不治的匪患根除,社会秩序好转,共产党人的为民情怀得以凸显,共产党的威信得到空前提高,为成都城市治理提供了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

(二) 镇压敌特分子,促进社会稳定

成都解放后,敌特分子时常制造武装暴乱或社会骚乱,破坏社会治安和革命秩序,威胁新生的人民政权,影响着共产党对成都城市治理的进程。基于此,共产党通过镇压敌特分子、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以此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维护社会秩序,为城市治理提供稳定的社会氛围。

一方面,成都市人民政府采取“麻痹稳住,防止逃跑,政策从宽”的方针,充分发挥政策威力,号召特务分子登记自首、悔过自新,视其情况作出相应的处理。共产党实行自动投案、真诚悔改者,从宽处理;立功者受奖;怙恶不悛、继续反革命活动者,一经查获,严惩不贷。1950年1月6日,成都警备司令部发布关于处理非法武装及散兵游勇的布告,要求流散于成都市区及城郊的散兵游勇一律到共产党指定的地点登记自首^{[5]143}。大部分敌特分子慑于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威力,纷纷到指定地点登记自首,悔过自新,重新做人。据资料显示,仅1950年2月至11月,成都市登记自首的国民党特务共有6070人,其中站长级以上大特务64人、组长级特级骨干842人;自首反动党团骨干分子1450人;自首游干班分子700多人^{[4]58}。老百姓对此无不奔走相告,额手称庆。共产党给特务分子悔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收罗稳住大部分敌特分子,让敌特分子找到自己的生路,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

另一方面,共产党坚决打击拒不悔悟、继续危害人民的敌特分子,降低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从而保证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稳定社会秩序。共产党实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方针,执行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根据罪恶轻重及悔过程度给予不同处理。根据1950年9月26日的《成都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关于八个月来的公安工作的报告》表明:1950年8个月来,共逮捕收押人犯3758人,处理人犯3022人。其中罪恶较轻、经教育后有悔过的人犯,经过一定手续释放与保释者有968人,送游民习艺所劳动改造者有364名,判处徒刑者有39人,送司法机关依法判处者有1495人,送有关机关部队处理者有87人,送疯人院有9人,对叛乱匪首与阴谋暴乱的主犯及惯匪依法处以极刑者有58人等^{[5]330}。总之,共产党实行“麻痹稳住,防止逃跑,政策从宽”的方针,坚决打击拒不悔悟、继续危害人民的敌特分子,反革命分子受到相应的惩罚,有效打击了敌特分子的嚣张气焰,初步安定社会秩序,社会风貌如春风尧舜,夜不闭户,为成都的城市治理创造了和平安宁的生产生活环境。

二、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为城市治理提供领导保障

成都解放后,中共成都地方党组织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川西区党委的领导下,彻底改造国民党旧的政权机构,建立和巩固体现人民意志的政权,为共产党开展城市治理提供领导保障。

(一) 建立新的政权机构,为机构运转提供组织保障

成都解放以后,共产党废除国民党旧政权的各级机构,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机构。

一方面,建立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废止保甲制度。成都解放后,中共成都市委、市人民政府从维护人民利益出发,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如共产党为了彻底打碎国民党的旧保甲组织系统,成都市人民政府通过增补户籍干部、登记户口与发放居民证,实行户政专任制,进行街道民主改革。成都市军管会于1950年4月19日颁布《成都市户口管理暂行办法》,规定除区级以上党政军机关、军工、部队、企业部门和外国侨民需要另外登记之外,所有的市民都应该依法办理户口登记,不允许不报或假报^{[6]90}。人民群众积极响应,主动登记户口,及时查清敌、我、友,建立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户籍管理制度的实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建立,人民群众以主人翁的身份参与讨论国家大事,使党的方针政策在基层生根发芽,密切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在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的成都市新都县农民孟吉喜说“我们人民好比碾子,共产党好比水;水来了,我们才转得起来!”^[7]这表明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提高了思想觉悟,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积极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建设贡献一份力量,充分彰显了“城市基层社会的全面组织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实现城市社会整合的强大组织保证”^[8]。

另一方面,组建人民政权的治理体系。共产党通过组建新的政府系统、公检法系统,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密切党群关系,提高办事效率,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为城市治理提供政权保障。成都解放伊始,党为了恢复城市的有序化和民心的稳定,选择保留区一级的行政建制。直到1950年7月,由于成都市区一级的行政区划交错杂乱,才使得14个区合并为8个区,并分别任命了各区的区委书记。8月14日,成都市人民政府进一步细化市政府各部门的分工,下设秘书处、民政局、工商局、税务局、人民法院、财经委员会、人民检察署、人民监察委员会等管理机构^{[5]224-225}。在中共成都市委的领导下,市政府各部门以全新的面貌开始工作。以司法工作为例,1950年共产党接管国民党的成都地方法院,先后成立了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司法处、成都市人民法院,为劳动人民掌握审判权提供了保障。司法机构除继续及时清理积案外,着重于各区公所建立区的调解组织,制定调解办法,召开调解工作座谈会,建立并开始健全下层调解机构,组织巡回审判,对旧司法人员有计划地进行新法律观与政策教育,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及时调解群众的纠纷,保护劳苦大众的利益。

(二) 改造旧人员,为新政权运转提供治理人才

成都解放初期,国民党官僚机构臃肿庞大,旧有人员数量众多。成都市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的约30万人,国民党政府公务人员和其他教职员约10万人^{[4]23-24}。共产党为了社会能够平稳运行、各项工作有序开展,需要彻底改造和妥善安置国民党的旧人员,使他们各得其所。

改造旧政权中的旧人员是一项最迫切繁重的任务。中共成都地方党组织接管成都后,贯彻党中央“深入了解情况,慎重接管”“依靠群众,充分利用旧人员”的指示,具体分析,采取大部分改造后使用的方针,但“劣迹昭著有严重贪污案件,并为群众十分痛恨者,经群众讨论后送法院依法处理,或遣散回家”^{[5]149}。这表明共产党对旧有人员的改造主要是通过集训、学习、改造,按照党的政策分情况予以妥善安置和处理,而不是随意遣散或轻率处理,体现了共产党坚定的人民立场和深厚的为民情怀。旧人员城市管理经验丰富,但他们一般都沾染了旧社会的恶习。为了使旧人员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作风,当廉洁奉公的勤务员,共产党需要教育改造旧人员,量才录用,在政治上适当安排,生活上妥善照顾。改造旧人员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需要在党的关怀与帮助下,依照相关的政策进行教育与改造。共产党依靠人民群众,教育与改造旧机构人员,提高他们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觉悟,从而为城市治理提供人才,使城市的生产生活秩序有序化。

(三) 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为机构的有效运行奠定制度基础

严明的入城部队纪律有助于更好地恢复城市秩序。请示报告制度是入城纪律的一项重要制度,能够有效避免接管部队或接管人员发生各种违反政策的事件,能够统一政策。1949年11月28日,中共西南局再三强调接管部队和负责干部需要熟悉尊重本地的风俗民情,不允许擅自发言与自作主张,应

“细心研究并严格遵照党对城市的各项政策办事,丝毫不得逾越,特别在外交问题上以及涉及人民的人权、财权问题上,任何机关与个人不得擅自处理,必须一律事先请示军管委”^{[6]50}。1950年1月,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出台了接管人员工作条例及接管纪律的规章制度,明确将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作为接管人员工作条例及接管纪律的一项重要内容^{[6]59-60}。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规定成都市军管会为军管期间成都市的最高权力机关,下设军事、政务、文教、财经、房产五个接管委员会和公安、华侨事务两个直属处,统一管理成都市的军事、民政等一切事务,从而保障接管工作的统一领导与有序开展。成都市军管会进一步明确各部门的接管范围及其负责人,重申“坚持各按系统,分别负责接管”^{[5]140}的原则,归口接管,即对批准接管对象,不得超越接管范围接管;对新的接管对象,要报告军管会审批,在未批准之前,只能履行保管责任;对发生的接管冲突,应迅速报告军管会;对非法接管的情况,要迅速查清由哪个接管单位非法接管的以及接管的财产,监督其立即交出,并报告军管会处理^{[5]142-143}。接管成都的工作纷繁复杂,困难重重,但接管人员坚持军管会的统一领导,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牢记接管工作纪律,廉洁奉公,受到群众竭诚拥护,老百姓称赞“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军队。”^[9]

三、恢复和发展经济,为城市治理提供物质基础

成都解放初期,经济萧条,市场混乱,大部分商业陷入瘫痪状态。面对千疮百孔的经济状况,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颁布一系列措施,从物质层面为成都城市治理提供保障,千方百计帮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以早日实现成都市的财政经济复苏,改善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

(一) 恢复和发展生产,促进经济复苏

成都在解放初期是一个商业消费性城市,且大多数工厂企业处于维持或停滞状态。为了尽快实现由消费城市向生产城市的转变,共产党组织老百姓努力恢复与发展生产。只有城市的生产工作恢复和发展,才能巩固人民政权,才能促进经济复苏。

一方面,重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春耕生产尤为重要。中共西南局在1950年2月发出关于“布置春耕工作的指示”,加强农业生产。中共成都市委、市人民政府贯彻落实农业生产的指示,引导群众生产,农业生产水平大幅度提高。据统计,成都市的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127.37万吨增加到1950年的137.02万吨,油菜籽产量由1949年的4.05万吨增加到1950年的4.47万吨,蔬菜产量由1949年的36.49万吨增加到1950年的37.25万吨^{[6]761}。显而易见,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不仅保障了成都居民的物质生活,为工业生产提供了生产原料,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这是共产党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思想在经济层面的重要体现,彰显了党和国家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与支持。

另一方面,加强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发展的同时,对私营经济发展予以鼓励扶持。《共同纲领》规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10]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制定了“四面八方”政策,使工商企业能够很好地发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稳定经济、安定人心的重要环节。1950年6月3日,成都市人民政府成立以宋应主任的中共成都市委财经委员会,领导成都工商业的发展。成都市人民政府还通过召开工商业者代表座谈会,成立成都市金融业联合贷款团和工商业调整研究委员会,按照“资方积极努力,工人支持,政府帮助”的方针,指导私营工商业调整生产经营结构,有重点地扶持工商业发展,帮助他们解决生产中的困难,解决纠纷矛盾,调动了他们生产经营的积极性。这表明共产党注重扶持与发展私营经济,是从有利于改善解放初期成都市的经济状况出发,是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的实际出发作出的决策。成都市工商联筹委会积极动员私营工商业者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坚持开工生产,开门营业。据资料统计,1950年成都市工商业申请开业的有1727户,其中工业136户、手工业703户、商业888户。工业主要有化工、机械、粮食加工等行业,商业有五金、电器、图书、教育用品、油粮、匹头等行

业^{[6]565-566}。这有助于保障成都市市场上粮、布、纱、糖等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能够稳定物价、安定人心,为解放初期成都经济的恢复发展贡献力量,从而夯实成都城市治理的物质保障。

(二) 整顿金融物价,恢复市场秩序

成都解放前,物价急剧上升,老百姓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1949年1月29日,蓉市物价陡涨,米每斗近金圆券100元,猪油每斤12元,人力车租每日10元。2月1日,成都物价倍涨,米每斗金圆券250元,猪肉每斤24元^[11]。成都物价飞涨,严重影响人民的生活。共产党接管成都后,积极整顿金融物价,恢复市场秩序,安定人民生活。

一方面,通过平抑物价来恢复市场秩序。成都解放初期,成都市军管会与市政府积极组织粮食和其他商品平价供应市场,市级机关、各区机关的党员干部积极利用舆论,向广大人民群众宣讲政策,如目前的经济形势、人民政府稳定物价的政策等。成都市军管会还发表布告,运用法律手段严厉惩处囤积居奇、抬高物价等行为^[12]。通过这些措施取得显著成效。成都市物价从1950年2月23日开始下降,大米每双市石降至60余万元(旧币),一般物价下降了50%~70%。至2月27日,成都市场已完全平静下来,恢复如常^{[4]31}。可见,共产党通过加强市场物价管理,稳定社会经济秩序,从而安定了民心,提升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为城市治理提供了重要保障。

另一方面,通过整顿金融秩序来恢复市场秩序。成都市军管会在接管官僚资本所属的中央银行、交通银行驻蓉单位,成都市、成都县银行,以及川盐、川康、大川、四明、通惠等旧金融机构的基础上,改造、改组和重新组建人民银行。1950年2月10日,成都市军管会开展拒用银圆、拥护人民币的宣传周。3月4日,成都市军管会颁布《管理私营银钱业暂行办法》,规定私营银行、钱庄、银号等均须限期登记,其资金必须有利于生产事业,不得用于金融投机^{[6]12}。成都市军管会还加大对投机倒把、破坏金融秩序等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1950年1—11月成都市军管会公安处共破获金融扰乱案593件,逮捕或拘留犯罪分子912人^{[4]31}。可见,共产党整顿金融秩序的政策体现了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保护人民群众的正当利益不受损害,从而达到稳定社会经济秩序的目的,为城市治理提供金融保障。

(三) 推行新税制,增加政府财力

解放初期成都市人民政府财政十分困难,税收几乎是财政的唯一来源。据时任成都市军管会委员马识途回忆,当时成都的财政很困难,除了从工商业资本家征税外,别无其他可靠来源。但是,每月政府这么多人要吃饭,要开支,没有钱怎么办?于是收税便成为最重要的工作^{[13]225}。税收工作关系着人民政权的巩固和发展,是城市治理工作的关键所在,“不会收税就不能巩固赢得的政权”^[14]。

税收是城市治理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更是一个政权运行的经济保障。共产党接管旧政府财税局,清理整顿原有的财务、税收、税制及1949年税务征收情况,本着简政轻赋的原则,决定废除国民党时期的各种苛捐杂税,实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税收政策。这一税收政策一方面是为了财政需要,能够为成都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经费保障,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应有贡献;另一方面是为了照顾发展生产与负担合理。1950年1月,为了保证工商业界纳税,成都市军管会财经接管委员会进一步加强税收宣传工作。成都市军管会财经接管委员会张韶方副主任委员向各行业解说人民政府的税收政策是为人民服务的,并要求各行业“务须按章交纳”^[15]。1950年4月10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宋应、米建书、马识途、王直等与商会负责人及各行业理事长商讨一季度“两税”征收意见,马识途在会上语重心长地说“要建设一个幸福美好的新中国就要发展生产,需要更多的资金。建设新中国是全国人民的头等任务,也是工商界的光荣任务。”^{[16]704}各行各业的理事长聆听后深受感动,认识到纳税是工商界责无旁贷的光荣任务,也是应尽义务。成都市很快形成“交纳‘两税’,迎接市工商联筹委会的诞生”的纳税热潮。据统计,1950年完成285亿元税收,1951年上升,完成427亿元税收^{[13]235}。由此看来,成都市大多数工商业者深明大义,积极拥护和支持税收政策,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为成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从而为城市治理提供财政保障。

税收不仅来自于民,更是用之于民。成都解放前,国民党政府在1949年的教育及文化、卫生、社会及救济、补助及协助等民生性财政支出预算只占到年度财政总支出预算的4.89%^{[17]68}。成都解放后,中共成都市委及市人民政府在1950—1952年的社会优抚救济、文教卫生科体等民生性财政支出,分别占到年度财政总支出的27.71%、17.28%、20.60%^{[17]93}。这说明在当时很有限的财政收入条件下,为了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共成都市委、市人民政府加大民生性财政支出,1950—1952年平均每年花费21.86%的财政支出,用于改善住宅、稳定物价、办教育、开展社会救济等。

四、确保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为城市治理提供社会保障

城市的衣食住行、卫生环境、就业等民生事业关系到国计民生,关乎社会稳定,体现城市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成都在解放初期交通困难,工业基础薄弱,商业不振,广大的城市贫民陷入失业和半失业。成都人口有501.32万,又是一个商业消费性城市,确保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成为解放初期中共成都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成都社会经济恢复生机与活力的头等大事。

(一) 恢复基础设施,方便群众生活

成都解放初期,“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公路难行,自来水不自来,下水道不下水,金河、御河年久不掏,污泥臭水满街横流”^{[16]703},严重影响着百姓的生活。恢复城市基础设施,保障市民的正常生活,成为成都市人民政府的一项紧迫任务。

成都解放后,中共成都市委、市人民政府为了方便群众生活,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入手,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基础设施的惠民措施。在城市供水方面,1950年成都市人民政府通过铺设管道、安装水桩、贷款人民币10亿元,用于扩大城市自来水供应量。到1952年底,成都市自来水的供水能力大幅度提高,已有5万城区市民用上了自来水,全年供水量由1949年的12万吨增加到19万吨,供水管道长度由8.5公里增加到25公里^{[6]772}。在交通设施方面,1950年3—8月,成都市人民政府翻修马路3条,建设东门大桥等重要桥梁4座,开辟皇城马路,安装交通干道路灯245盏,新修岗台32个^{[5]241}。从1951年起,成都市人民政府先后拨款380亿元用于城市公共交通的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直到1952年,成都市公共汽车公司正式运营,开通了牛市口至将军衙门、盐市口至火车北站以及盐市口至浆洗街三条公交线路,方便居民出行,半年运送乘客275万人次。此外,中共成都市委、市人民政府还加强对城市公共文化场所及设施的改造和建设,在修葺草堂寺、武侯祠、青羊宫、文殊院、昭觉寺等名胜古迹的同时,建设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人民公园、南郊公园、望江公园、市人民体育场等,为市民群众提供游览休息和体育活动的场所,也为后来开展城市园林规划建设和发展文化旅游事业创造条件。可见,成都市人民政府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在恢复基础设施工作中生动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改善了成都市民的居住生活条件,城市面貌得到初步改善。

(二) 开展社会救济,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计

成都解放初期,城市失业人口和贫民在15万以上,加上被接收的各级人员至少在15000人以上(不包括军队),每家以四口计,需解决6万人的生活问题^{[6]48-49}。这些人员无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有些因生计所迫或其他原因,时常干偷窃、诈骗、抢劫、杀人越货等违法犯罪之事,严重危害社会秩序。

中共成都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积极开展社会救济,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首先,妥善安置各类老弱残疾人员,保障其基本的物质生活。1950年2月11日,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布处理干部生活费和国民党伤兵治疗费用的决议,要求“原国民党的残疾人员(确实残废)不论是何部门收容的,一律交政务处处理”^{[5]151}。3月29日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布旧人员中老弱残废处理草案,详细规定了对流散于成都市无家可归的各类老弱残疾人员由政府 and 军队有关部门妥善安置处理。其次,努力恢复和维持黄包车夫、苦力、茶楼、酒馆、饭店等服务行业的经营,使其有生活保障。再次,为了便于登记失业工人,开展生产自救,组织建立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既在物质上给予失业工人帮助,也积极组织

他们从事生产劳动,走上新的生活道路。最后,加强对成都市乞讨人员的救济工作,制定收容处置方针,对乞丐收容处置、教育改造。共产党接管成都时,在各地城镇和交通要道设置收容所,收容流落的国民党部队官兵,让其吃饱饭,组织他们学习共产党的有关政策。军管会还要求成都市救济分会接手本市接受法美等国家津贴的张家巷天主堂孤女院、孤老院,平安桥天主堂圣婴孤女院,中西组合慈善孤儿院、孤老院,私立盲哑小学等^{[6]578}。总之,成都市人民政府积极开展社会救济工作,体现的是共产党人处处爱民为民的公仆情怀,使困难群众的基本生计得到保障,让困难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社会风气日趋好转,为城市治理提供了社会保障。

(三) 改善卫生状况,保障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

解放初期的成都是一座脏乱差的落后城市,城内垃圾堆积如山,下水道年久失修,不少街道污水泛滥,城内低地、洼地及明沟污水流溢,发出臭味,滋生蚊蝇,多数居民的居住条件恶劣,堪比贫民窟。以解放初期成都市迎曦街的卫生状况为例,迎曦街整条街污水积存,脏臭不堪,一到夏天蚊蝇成群,街道无人打扫,鸡、鸭在街上乱跑,居民房屋多年不打扫^[18]。解放初期的成都不仅卫生环境脏乱差,而且医疗卫生资源有限。1949年成都市拥有501.32万人口,却只有1347张医院床位、2511个卫生技术人员,远远不能满足居民的需要^{[6]759,771}。如此落后的卫生状况导致天花、麻疹、伤寒和回归热等许多疫病流行,严重影响着人民的身心健康。

成都解放后,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中共成都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把改善卫生状况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问题。1950年,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讲究卫生,消灭疾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运动。中共成都市委、市人民政府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成立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颁布《成都市清洁管理办法》《成都市厕所、粪坑管理暂行办法》等重要法规,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和开展了“消灭病害,讲究卫生,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公共卫生活动,维护城市公共卫生安全。成都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采取领导、群众与卫生技术人员相结合的方针,发动和组织90%以上的人民群众参加治理城市公共环境卫生,用肩挑手抬的方式,清除20余万吨陈年垃圾,填平数百亩坑洼、死水塘,封闭千余处不合格粪坑、厕所,改造街道、机关单位和院落公私厕所4000余座,消灭了蚊、蝇、老鼠、跳蚤等病媒虫害的滋生场所,并大量杀灭苍蝇、蛆蛹、老鼠和跳蚤^[19]。通过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成都市社会面貌焕然一新,既形成一种讲卫生、爱清洁的社会风气,也使许多昔日的臭街陋巷改变了面貌,如御河、皇城坝、全心巷等地区成为全国卫生先进典型。成都市人民政府成立市卫生委员会,按区建立八个卫生事务所,整顿市立医院,广泛开展群众性防疫工作,保障劳动群众的健康。1950年3—8月,成都市共有48589人完成了春季种痘,霍乱预防注射人数达到291772人,占全市人口的50%,超过预定计划^{[5]241}。成都市人民政府不仅及时采取措施加强防疫工作,而且还积极开展医疗卫生资源建设。据统计,1949年成都医疗卫生机构共120个、1347张医院床位、2511名卫生技术人员,1952年增加到294个医疗卫生机构、2230张医院床位、6520名卫生技术人员^{[6]771}。可见,成都市人民政府通过接管和创办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卫生防疫工作,在提高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环境以及改善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体现着共产党深厚的为民情怀。

综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共产党从接管城市开始,就旗帜鲜明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在稳定社会秩序、巩固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经济、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70多年来,尽管时代发生了深刻变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在新时代仍然需要大力传承和弘扬。

参考文献:

-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治理能力和水平 [N]. 人民日报,2019-11-04(1).

- [2] 吕晨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主要城市社会问题及其治理: 1949 - 1957 年 [D]. 成都: 四川大学, 2005: 77.
- [3] 许蓉生. 建国初期成都市稳定社会的历史经验 [J]. 巴蜀史志, 2006(4): 48 - 50.
- [4] 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成都历史: 第 2 卷 [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 [5] 成都市档案馆. 成都解放 [M]. 北京: 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9.
- [6] 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 成都市档案局(馆). 中国共产党成都历史资料丛书: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资料选编: 1949.12 - 1956.9 [G]. 2007.
- [7] 政协成都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 成都文史资料: 第 32 辑 [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2: 78.
- [8] 高中伟. 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城市基层组织重构的历史启示 [J]. 城市发展研究, 2011(9): 113 - 117.
- [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成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 第 18 辑 [G]. 1988: 10.
-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1 册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7.
- [1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 18 辑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79: 3 - 4.
- [12] 《贺龙传》编写组. 贺龙传 [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 271 - 272.
- [13] 成都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 成都文史资料选编: 建国初期卷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7.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文集: 上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65.
- [15] 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 接管成都 [M]. 成都: 成都出版社, 1991: 359.
- [16]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回忆城市接管: 下 [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
- [17] 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成都市志: 财政志 [M]. 成都: 四川辞书出版社, 2001.
- [18] 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成都市志: 环境卫生志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4: 8.
- [19] 《当代四川》丛书编辑部. 当代成都简史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109.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Chengdu Urban Governance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CHENG Fugen

(College of Marxism,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17, China)

Abstract: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urban governance. After the liberation of Chengdu,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hould stabilize the social order as soon as possible to provide the primary condition for urban governance. The establishment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new people's political power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vides leadership guarantee for urban governance. The party restores and develops the economy to provide the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the urban governance. The party ensures that the basic livelihood of the people provides social security for urban governance. By summing up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urban governance in Chengdu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urban governanc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governance system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Chengdu; urban governance; historical experience

(责任编辑: 李晓梅)